

中国在尼日利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与突破^{*}

——以“中山富诚案”为例

彭先琦

【内容提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渐由资本输入国变成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的大国，对非洲的投资和纠纷也不断增多。作为首例中国投资者对非洲国家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产生投资争端后，寻求权利救济路径的困境。如诉诸东道国诉讼久拖不决、被东道国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阻断商事仲裁、被东道国援引岔路口条款挑战投资仲裁管辖权等。既有东道国本地保护之因，亦有中国投资者不熟悉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之故。中国投资者应在现有国际条约和中尼 BIT 框架下审慎选择争议解决方式，也可依托母国适时更新中尼 BIT 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完善保护投资者之法律制度，最后可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设立中非投资争议解决中心，友好解决中非投资争议。

【关键词】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岔路口条款；禁止仲裁令；中尼投资争端

【作者简介】彭先琦，比利时根特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比利时根特，9000）。

^{*}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委“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留学生项目（与比利时根特大学配套资助奖学金）”（项目编号：202107650032）的阶段性成果。

前言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非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经贸往来和投资合作日益增加。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截至2020年底,中国对尼日利亚直接投资存量为23.7亿美元,涵盖石油开采、经贸合作区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等多个领域。^①这些领域又属于投资争议较多的领域,如何保障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的投资权益并寻求救济途径是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投资的重要难题。“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政府投资仲裁案”(简称“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是中国企业首次对尼日利亚提起投资仲裁的案件,该案历时多年,历经东道国法院诉讼、第三国商事仲裁、东道国发布禁止仲裁令、磋商、投资仲裁等多种救济途径,最终获得投资仲裁庭的支持。该案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尼日利亚双边投资协定争端机制条款的适用对仲裁庭管辖权的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寻求投资争端机制救济的困境和艰辛。对该案的分析研究可为中国政府未来与尼日利亚谈判缔结新的双边投资协定或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国在尼日利亚和非洲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一定借鉴。

一 “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简介^②

(一) 案情概要

2010年,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珠海中富”)与奥贡自贸区公司签署框架协议(简称“2010年框架协议”)。根据该框架协议,珠海中富在奥贡自贸区建立富诚工业园,并有权开发、运营该工业

^①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尼日利亚(2021年版)》,商务部,2022,第33~34页。

^② Zhongshan Fucheng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Ltd. v. 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 裁决文书可参见 <https://jsumundi.com/en/document/decision/en-zhongshan-fucheng-industrial-investment-co-ltd-v-federal-republic-of-nigeria-final-award-monday-1st-march-2021>。Accessed 2022-09-30。

园。而后,珠海中富、奥贡自贸区公司和中山富诚工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山富诚”)签署协议,约定将珠海中富在“2010 年框架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中山富诚。中山富诚随后在奥贡自贸区内设立全资子公司中富公司,以负责开发、运营和管理富诚工业园。2011 年 7 月,中山富诚支付了第一期土地使用权费,约 545.5 万元人民币。2013 年,中富公司与奥贡州政府、赞尼特环球商人有限公司(Zenith Global Merchant Limited,简称“赞尼特公司”)签署了合资协议(简称“2013 年合资协议”),约定由中富公司开发、运营、管理奥贡自贸区,并拥有奥贡自贸区公司 60% 的股份,争议解决方式为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3)(UNCITRAL Arbitration Rules 2013)进行仲裁。2016 年 4~8 月,奥贡州政府以中富公司“欺诈性地转换国有资产”,且存在欺骗和虚假陈述为由,终止了双方的特许权协议,将中富公司驱逐出奥贡自贸区,并联合警方对中富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逮捕、拘留。随后,该案进入了漫长的投资争议救济之路。

2016 年 8 月,中富公司向尼日利亚阿布贾联邦高等法院起诉尼日利亚出口加工管理局(NEPZA)、奥贡州司法部部长(州政府代表)和赞尼特公司,要求依据先前的任命文件恢复对奥贡自贸区的管理权。2016 年 9 月,中富公司向奥贡州高等法院起诉奥贡自贸区公司、奥贡州政府及其司法部部长,要求依据“2010 年框架协议”恢复对富诚工业园的所有权,并提出赔偿 10 亿美元。然而,上述案件尚未进入实体审查程序就于 2018 年 3~4 月被终止。此外,中富公司还于 2016 年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申请商事仲裁,^① 被申请人为奥贡州政府和赞尼特公司,仲裁地点为新加坡。2017 年 1 月,赞尼特公司向奥贡州高等法院申请禁止仲裁令。2017 年 3 月,奥贡州高等法院以尼日利亚(而非新加坡)与本案具有实质上的密切联系以及避免仲裁程序被滥用为由批准了该禁止仲裁令。2017 年 9 月,中山富诚向尼日利亚发出磋商通知,但一直未收到答复。2018 年 8

① SIAC Case No. ARB300/16/JCL, 参见 Zenith Global Merchant Limited v. Zhongfu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IG) FZE, Ogun State Government and Attorney-General of Ogun State, High Court Ogun Division, Nigeria, 3PLR/2017/348 (HC)。判决书可参见 <https://judgements.lawnigeria.com/2019/07/08/zenith-global-merchant-limited-v-zhongfu-international-investment-nig-fze-ors/>。Accessed 2022-09-30。

月, 中山富诚根据《中国—尼日利亚 BIT》^① 申请投资仲裁, 仲裁地为伦敦。中山富诚主张尼日利亚政府违反了《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的持续保护、公平公正待遇、征收补偿等义务, 要求尼日利亚政府赔偿损失及相关费用。2021 年 3 月, 仲裁庭作出裁决, 判令尼日利亚政府赔偿中山富诚相关损失和费用约 6800 万美元。该仲裁裁决于 2021 年 12 月获得英国高等法院的承认, 这意味着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取得了胜利。此外, 中山富诚还于 2022 年 1 月向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申请执行该仲裁裁决, 并于 2023 年 1 月获得法院支持。但截至 2023 年 2 月, 尼日利亚政府尚未支付 6800 万美元的赔偿款。该案是首例中国企业对非洲东道国提起投资仲裁并获成功的案件, 是中国企业利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海外维权的一个重要突破, 也将为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投资提供清晰的维权途径。

(二) 法律争议与裁判观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仲裁庭是否具有管辖权, 即中山富诚是否拥有《中国—尼日利亚 BIT》下的“投资”, 及是否因选择国内法院救济程序触发“岔路口条款”(Fork in the Road) 而排除仲裁。仲裁庭并未采纳尼日利亚政府的主张, 对“投资”采取宽泛解释, 认为中山富诚在尼日利亚的资产投入和经营已构成《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的“投资”。在“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上, 仲裁庭采用“三重相同测试”(Triple Identity Test) 予以判断, 认为国内法院诉讼和投资仲裁的当事人、诉因和诉讼请求均不相同, 应属于不同的法律程序, 《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的岔路口条款并不适用本案件, 国内法院的诉讼程序并不能阻却国际仲裁的进行, 因此仲裁庭对该案件有管辖权。

在商事仲裁程序中, 争议的问题则是国际平行程序中的管辖权冲突, 即同时提起法院诉讼和仲裁后, 被申请人可否向尼日利亚法院申请禁止仲裁令, 以及尼日利亚法院是否有权和应该发布该禁止仲裁令。对此,

① 中国和尼日利亚政府最初于 1997 年 5 月 12 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 但该投资协定尚未生效。2001 年 8 月 27 日, 中国和尼日利亚政府签署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简称《中国—尼日利亚 BIT》), 该协定正式取代了 1997 年的投资协议, 并已于 2010 年 2 月 18 日正式生效。参见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ies/bit/949/china-nigeria-bit-2001>。Accessed 2022-09-30.

尼日利亚奥贡州高等法院认为尼日利亚与该争议具有最实质性密切联系,法院有权且应该发布禁止仲裁令,禁止仲裁程序继续进行。^①

二 中国投资者—尼日利亚投资争端机制的现实困境

《中国—尼日利亚 BIT》及投资协议是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投资权益的保障,对条款解释和适用的差异会增加争端解决机制的不确定性,如对“投资”的认定标准、“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会阻却仲裁程序的进行。尼日利亚法院的禁止仲裁令说明本地保护主义仍是桎梏投资争端机制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寻求投资争端救济途径陷入泥沼。

(一) “投资”的认定标准——主观解释或客观解释

关于“投资”的认定,对仲裁管辖权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ICSID 公约》)第 25 条规定,仲裁庭仅受理因投资而产生的争议,但公约并未对“投资”作出明确界定,而是交由各国在国际投资协定(IIA)中自主约定。《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对“投资”采用了以财产为基础的定义模式,一方在另一方领土内所投入的各种财产均可被认定为投资,包括:(1) 动产,不动产及抵押权、留置权或质权等其他财产权利;(2) 股份、债券、股票或其他在公司的权益;(3) 与投资有关的金钱请求权或其他合同项下的具有财务价值的行为请求权;(4) 知识产权,特别是著作权、专利、商标、商名、工艺流程、专有技术和商誉;(5) 法律或法律允许依合同授予的商业特许权,包括勘查、耕作、勘探、开发或开采自然资源的特许权。^② 该协定以列举的方式限定了投资的范围,防止投资的概念过于宽泛,避免使东道国陷入仲裁案件的泥潭。但同时又以“包括但不限于”的开放式

① Zenith Global Merchant Limited v. Zhongfu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IG) FZE, Ogun State Government and Attorney-General of Ogun State, High Court Ogun Division, Nigeria, 3PLR/2017/348 (HC).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0 年 2 月 25 日,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h/aw/201002/20100206795350.shtml>。

方式为新的经济行为纳入投资范畴留有空间,以给予投资者充分的保护。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仲裁庭依据《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的“投资”定义条款,认定中山富诚在尼日利亚持有的公司股份、金钱投入和经济行为已构成“投资”,从而确认仲裁庭具有管辖权。仲裁庭在界定投资时,直接依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投资”定义条款进行解释,并未附加其他严格的标准。对于仲裁庭的决定,尼日利亚政府提出异议,主张应依据客观标准对“投资”进行解释,尤其要考量“投资”是否具备对东道国有贡献(contribution)、运营风险(operational risk)、持续期间(duration)等因素。尼日利亚政府认为中山富诚在尼日利亚的经济行为不具备上述三个要素,从而不赞成《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关于投资的定义,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

仲裁庭对投资概念进行解释的方法属于主观主义解释方法,认为若有争议的投资涵盖在投资协定(BIT)定义的范围内,则视为当事方同意提交仲裁,仲裁庭不再对是否符合《ICSID 公约》第 25 条进行解释。^①这一解释方法以缔约国的自由意志作为判断仲裁庭是否拥有管辖权的依据,主要参照涉案当事国签署的投资协定进行解释。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在对条约进行解释时,应按照上下文及条约目的进行善意解释。该解释方法能较好反映当事国的条约缔结目的和共同合意,因而在多个案件中被采用。如在 SGS v. Pakistan 案^②和 SGS v. Philippines 案^③中,仲裁庭认为 BIT 中对投资的定义较为宽泛,应按照上下文、目的和宗旨及通常含义对条约术语进行解释。在 Philippe Gruslin v. Malaysia 案^④中,仲裁庭认为《ICSID 公约》第 25 条并没有涉及投资定义,不应“投资”进行限制性解释,应当根据双边投资协定来判断。在 Azurix Corp. v. Argentine 案^⑤和

① 朱文龙:《国际投资领域投资定义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东方法学》2014 年第 2 期,第 154 页;何芳:《论 ICSID 仲裁中的投资定义》,《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0 期,第 101 页。

②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 A.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ICSID Case No. ARB/01/13,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6 August 2003.

③ SGS Société Générale de Surveillance S. A. v.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ICSID Case No. ARB/02/6,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29 January 2004.

④ Philippe Gruslin v. Malaysia, ICSID Case No. ARB/99/3, Award on Jurisdiction, 28 November 2000.

⑤ Azurix Cor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8 December 2003.

Camuzzi v. Argentine 案^①中, 仲裁庭认为如果争议当事方明示或暗示地将一项交易当作投资达成了共识, 那么《ICSID 公约》第 25 条所指的投资就应当符合当事方的共识, 因此, 任何交易都可以依据当事方的合意被包含在《ICSID 公约》的范围内或被排除在外。主观主义解释方法侧重于对条约进行目的解释和善意解释来定义投资, 赋予仲裁庭较大自由裁量权, 在投资保护方面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国际投资协定是投资仲裁的基础, 仲裁庭的管辖权来源于缔约国的主权让渡和共同合意, 对缔约国“同意”的忽视, 将动摇国际投资仲裁的合法性根基, 因此, 依据 BIT 来解释投资具有合理内核。但另外, 该解释方法给予投资宽泛的定义, 使得仲裁庭受理的案件范围扩大, 增加了投资者滥诉的可能性和东道国被诉的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投资仲裁的合法性危机, 以致越来越多的国家考虑退出或抛弃投资仲裁机制, 转而诉诸国内司法途径, 滋生卡尔沃主义。

尼日利亚政府解释投资的方法属于客观主义解释方法, 该方法在判断投资是否存在时需考虑有争议的投资是否同时被涵盖于当事方同意的范围之内 (通常规定在 BIT 中), 以及符合《ICSID 公约》中对投资的定义。^② 客观主义解释方法认为《ICSID 公约》第 25 (1) 条包含了对投资的客观要求, 投资应该具备一些客观特征, 如持续时间、定期的收益和回报、承担风险、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等。^③ 该解释方法在仲裁庭中的适用始于 Fedax v. Venezuela 案,^④ 仲裁庭在该案中首次援引客观特征要素来界定投资, 如一定的持续时间、承担风险、对东道国经济发展有贡献等。这一观点被其后许多案件援引, 并在 Salini v. Morocco 案^⑤中确定了判断投资的四个客观标准, 即著名的 Salini 标准。根据这一标准, 投资只有具备以下四个要素, 才是《ICSID 公约》中的适格投资, 即 (1) 资金或资

① Camuzzi International S. A.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3/2, Decision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11 May 2005.

② 赵骏:《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定义的张力和影响》,《现代法学》2014 年第 3 期, 第 164 页;何芳:《论 ICSID 仲裁中的投资定义》,《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0 期, 第 104 页。

③ Christoph H. Schreuer, *The ICSID Convention: A Commenta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5 - 127.

④ Fedax N. V. v. Republic of Venezuela, ICSID Case No. ARB/96/3,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 to Jurisdiction, 11 July 1997.

⑤ Salini Costruttori S. p. A. and Italstrade S. p. A. v. Kingdom of Morocco, ICSID Case No. ARB/00/4,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3 July 2001.

产的投入, (2) 一定时间的持续, (3) 交易活动中的风险承担, (4)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贡献。Salini 标准为仲裁庭判断一项交易是否属于投资提供了客观标准, 使仲裁庭更容易对交易的性质进行判断, 在其后的案件中被广泛采用和发展。如在 Joy Mining v. Egypt 案^①和 Jan de Nul v. Egypt 案^②中, 仲裁庭便完全采纳了该方法来界定投资。在 Phoenix v. Czech 案^③中, 仲裁庭新增投资要符合东道国法律和善意这两条标准, 对投资的条件进行更严苛的审查。在 Saba Fakes v. Turkey 案^④及 Quiborax v. Bolivia 案^⑤中, 仲裁庭对 Salini 标准进行了批判性接受, 认为前三个要素已构成判断投资的充分必要条件, 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应是投资的结果, 而不能作为投资的条件。仲裁庭在援引这一标准时, 并不是僵硬地机械式适用, 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采用了更灵活务实的解释方法。客观主义解释方法为仲裁庭在投资活动日益复杂难以判断之际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国际投资所需求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对当事方同意提交仲裁的案件进行客观审查, 可避免投资者滥诉, 缓解投资仲裁因对外国投资者过度保护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另外, “同意” 是仲裁庭管辖权的基石, 《ICSID 公约》中第 25 条并未包含定义投资的客观标准, 仲裁庭的这一解释方式属自身权限的扩张,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缔约方意思自治和条约解释权的侵蚀, 背离了条约的缔结本意。^⑥

国际投资仲裁中, 仲裁庭对主观主义解释方法和客观主义解释方法一直争论不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也在 2011 年的报告中指出: 到底使用哪种方法取决于国际投资法的目的, 如果其目的是投资保护则应采用主观主义; 而如果是国际合作则应采用客观主义, 而 ICSID 倾向于哪种还尚待分晓。^⑦ 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关于投资定义

① Joy Mining Machinery Limited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3/11, Award, 6 August 2004.

② Jan de Nul N. V. and Dredging International N. V.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4/13,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6 June 2006.

③ Phoenix Action Ltd. v. Czech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6/5, Award, 15 April 2009.

④ Saba Fakes v. Republic of Turkey, ICSID Case No. ARB/07/20, Award, 14 July 2010.

⑤ Quiborax S. A. and Non-Metallic Minerals S. A. v. 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 ICSID Case No. ARB/06/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7 September 2012.

⑥ 何芳: 《论 ICSID 仲裁中的投资定义》, 《河北法学》2018 年第 10 期, 第 108 页。

⑦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1, p. 119.

的分歧也反映出在国际投资仲裁中,两种解释方法双轨并行仍是常态,任何一种方法均不具有压倒性优势。虽然本案中仲裁庭采用主观主义解释方法确认了仲裁庭的管辖权,支持了中国投资者的诉求。但尼日利亚政府援引了投资的客观特征标准认为中山富诚在尼日利亚不构成投资,以仲裁庭无管辖权为由提出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承认与执行,尼日利亚政府的这一主张是否会得到法院支持,尚未可知。且仲裁裁决不具有先例效力,仅约束争议双方,这使得投资定义将仍处于一种波动状态。而投资的定义对于仲裁管辖权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尼日利亚 BIT》下,中国投资者可否有效运用投资仲裁机制解决投资争议面临不确定性。

(二)“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三重相同原则或基本依据标准

《中国—尼日利亚 BIT》第 9 条规定:(1) 缔约一方投资者与缔约另一方的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2) 如果争议在 6 个月内未能协商解决,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有管辖权的法院;(3) 如果争议在诉诸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后 6 个月内仍未能解决,可应任何一方的要求,将争议提交专设仲裁庭。如有关的投资者诉诸了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程序,本款规定不应适用。^① 该规定又称“岔路口条款”,即外国投资者有权就争议选择东道国法院救济或国际投资仲裁,一旦选择了其中的一种方式,便为终局。^② 作为用尽东道国当地救济原则的改进,岔路口条款赋予了投资者选择当地救济或国际仲裁的主动权,较好地平衡了东道国坚持国内司法主权的的要求以及投资者诉诸国际仲裁机制的诉求,以及避免平行程序。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不时有投资者先在东道国提起诉讼,在败诉或预测无胜诉把握后,又依条约提起国际仲裁,从而触发岔路口条款能否适用的问题。仲裁庭在判断岔路口条款的适用时,借鉴了既判力 (*Res Judicata*) 原则的要求,即要求救济 (*petitum*) 相同、诉因 (*causa petendi*) 相同和双方当事人 (*per-*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政府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0 年 2 月 25 日,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h/aw/201002/20100206795350.shtml>。

② R. Dolzer, C. Schreuer,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67.

sona) 相同,^① 来判断其受理的投资争端是否与东道国法院受理的争端相同。晚近的仲裁裁决几乎都对三重相同标准采取严苛适用、严格解释的态度,认为除非双方主体、标的和诉因都完全一致,否则不能触发岔路口条款,即使某一项要件存在实质上的联系或一致。如对当事人一致性进行判断时,仲裁庭认为国际仲裁中的申请方和东道国国内诉讼中的起诉方即便是母子公司关系,也构成不同的申请方,不适用岔路口条款。^② 若国内诉讼中的被诉方是东道国地方政府,而国际仲裁中的被申请人是东道国中央政府,也属不同的被诉方,岔路口条款不予适用。^③ 在判断诉因和标的一致性时,即使争议是基于同一事实,仲裁庭会因诉因不同,如国内程序是合同之诉,国际程序是条约之诉,判定国内程序和国际程序的非同一性,从而不触发岔路口条款。^④ 仲裁庭还会以国内程序是国内法之诉,国际仲裁是国际法之诉,二者诉求不同为由,不启用岔路口条款。^⑤ 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仲裁庭沿袭了先前案件中所采用的三重相同标准,认为:(1) 国内诉讼程序的原告是中富公司,国际仲裁程序的申请人是其母公司,二者属不同主体;(2) 国内诉讼是合同之诉,国际仲裁是条约之诉,二者诉因不同;(3) 国内诉讼是要求恢复合同项下的权利,国际仲裁是要求赔偿,二者诉讼请求不同。依据三重相同测试,岔路口条款不予适用。由此可知,在判断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上,国际仲裁中普遍采用三重相同原则,并对该原则进行严格的解释,从而可

-
- ① 徐崇利:《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选择“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权利之限度》,《国际经济法学刊》2007年第3期,第127页;傅攀峰:《国际投资仲裁中既判力原则的适用标准——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4期,第146页。
- ② 如 *Enron v. Argentina* 案, *Enron Creditors Recovery Corporation (formerly Enron Corporation) and Ponderosa Assets, L.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3,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 August 2004; *Genin v. Estonia* 案, *Alex Genin and Others v. Republic of Estonia*, ICSID Case No. ARB/99/2, Award of the Tribunal, 25 June 2001。
- ③ 如 *Azurix v. Argentine* 案, *Azurix Corp.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8 December 2003。
- ④ 如 *CMS v. Argentina* 案, *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v.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1/8,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17 July 2003; *Toto v. Lebanon* 案, *Toto Costruzioni Generali S.p.A. v. Lebanese Republic*, ICSID Case No. ARB/07/12,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11 September 2009。
- ⑤ 如 *Bayindir v. Pakistan* 案, *Bayindir Insaat Turizm Ticaret Ve Sanayi A.S. v.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ICSID Case No. ARB/03/29,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November 14, 2005。

使投资者获得国际仲裁救济。

对于仲裁庭的观点,尼日利亚政府提出异议,认为:(1)中富公司虽然是国内诉讼的原告,但是中山富诚是基于尼日利亚法律要求而设立的,由其全资拥有且实际控制,应视为同一主体;(2)三重相同原则并非合适的判断标准,而应该采取基本依据标准(fundamental basis);(3)国内诉讼和国际仲裁是基于同一事实,基本权利都源自双方合同,都源于相同的不当行为,均请求赔偿。因此应启用岔路口条款,仲裁庭无管辖权。尼日利亚政府所采用的标准是新近兴起的基本依据标准。该标准要求不能机械地依据三重相同原则来解释岔路口条款的适用,而是要依据两个诉求基本依据是否相同,来判断国内诉讼的诉求是否独立于国际仲裁。^①该标准最初在 *Pantechniki v. Albania* 案^②中被援引,仲裁庭认为同一事实可产生不同的法律主张,相似的申请人其诉讼理由可能不同,应依据是否具有同一基础性来源(same normative source)判断两个诉求是否独立,基于 BIT 提起的国际仲裁和基于合同提起的国内诉讼,都是基于合同损失请求赔偿,因此并非独立的两个诉求,从而适用岔路口条款。而后在 *H&H v. Egypt* 案^③和 *Supervision y Control v. Costa Rica* 案^④中,仲裁庭援引基本依据标准判定国际仲裁和国内诉讼程序具有相同的事实和基本依据,从而触发岔路口条款,仲裁庭对条约索赔无管辖权。这表明投资仲裁庭对岔路口条款的适用和态度正在发生改变,不再固守三重相同原则的僵化适用,开始通过分析实质要素来判断“投资争端”的同一性,岔路口条款的适用性被仲裁庭重新发挥。

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关于岔路口条款适用的争议,切实反映了当前国际投资仲裁对该条款适用的争论。虽然三重相同原则一直占主导地位,但对该原则的争议与批评从未停止,三重相同原则的适用标准过于严格和僵化,投资者可通过控股股东和子公司的名义排除当事方的同

① Markus A. Petsche, “The Fork in the Road Revisited: An Attempt to Overcome the Clash Between Formalistic and Pragmatic Approach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 2019, 18 (2) p. 413.

② *Pantechniki S. A. Contractors & Engineers v. Republic of Albania*, ICSID Case No. ARB/07/21, Award, 30 July 2009.

③ *H&H Enterprises Investments, Inc. v. Arab Republic of Egypt*, ICSID Case No. ARB/09/15,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5 June 2012.

④ *Supervision y Control S. A. v. Republic of Costa Rica*, ICSID Case No. ARB/12/4, Award, 18 January 2017.

一性，也可以通过选择不同被诉方排除同一性；若是存在相同的诉讼标的和事由，投资者可通过肢解诉求、更换诉求事由来规避同一性。投资者通过灵活变通可轻易规避岔路口条款，从而使得该条款虽然体现在国际投资条约中，却形同虚设。投资者可在选择东道国当地救济后，再从国际仲裁中获益，而使东道国陷入国内诉讼和国际仲裁的双重程序中。仲裁庭严格适用岔路口条款，有扩大其管辖权之故，也有偏袒投资者之嫌，几乎使得岔路口条款名存实亡，这无疑增加了平行程序的概率，造成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失衡。从而招致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① 基本依据标准则注重从“投资争端”的实质分析国内诉讼和国际仲裁的同一性，对适用岔路口条款采取积极、宽松的解释，能缓解三重相同原则对适用岔路口条款的僵化。虽然该标准并不能使岔路口条款的适用状况得以完全改善，但表明仲裁庭对待岔路口条款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对于在尼日利亚及非洲投资的中国投资者而言，在发生投资纠纷后，基于对诉讼成本、方便程度以及与东道国的关系等因素的考虑，大多会先选择在当地法院诉讼，在诉讼受阻或败诉后，再提起投资仲裁。^② 这无疑增加了适用岔路口条款的概率，从而无法寻求国际仲裁救济。虽然目前投资仲裁庭的主流观点是采用三重相同原则的严格解释，排除岔路口条款的适用，但国际投资保护的趋势已从倾向于保护投资者利益转为寻求东道国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平衡，基本依据标准逐渐被仲裁庭接受，开始使岔路口条款重新发挥作用，尼日利亚政府也依据该标准提出管辖权异议。在《中国—尼日利亚 BIT》下，中国投资者如何在不触发岔路口条款的情况下，有效运用投资争端机制进行权利救济仍需进一步解决。

（三）尼日利亚法院的长臂管辖——禁止仲裁令

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中富公司在提起投资仲裁前，还依投资协议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起商事仲裁。但之后基于尼方的请求，尼日利亚法院以尼日利亚与仲裁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和避免程序滥用为由，发布禁止仲裁令，禁止商事仲裁程序继

① 徐崇利：《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岔路口条款”：选择“当地救济”与“国际仲裁”权利之限度》，《国际经济法学刊》2007年第3期，第134页。

② 朱伟东：《中国与非洲民商事法律纠纷及其解决》，《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76页。

续进行。^① 禁止仲裁令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源于英国, 是指经仲裁协议当事人或第三人申请, 由法院签发的旨在阻止当事人、仲裁庭启动或继续进行仲裁的限制性命令, 包括临时性的禁止仲裁令和永久性的禁止仲裁令。^② 禁止仲裁令的签发常见于国际平行程序当中, 即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或仲裁后, 另一方当事人再另行提起仲裁或一方当事人再针对同一被告另行提起仲裁。法院在签发禁止仲裁令时一般会参考实体性因素和程序性因素。实体性因素的主要判断标准是仲裁程序是否公正, 如仲裁是否具有压迫性、是否滥用仲裁程序、是否因程序不公正损害当事人利益等。程序性因素则要求禁诉令的申请须及时提出, 不得延迟申请。目前, 各国对禁止仲裁令的签发条件并无成文法规定, 由法院自由裁量。尼日利亚法律也未对法院是否有权签发禁止仲裁令以及签发的条件进行规定。《联邦高等法院法案 (2004)》第 13 条规定法院可在其认为合适的时候签发禁令。^③ 至于该禁令的性质以及签发的条件, 法案并没有进一步说明。

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 尼日利亚法院认为因上级法院有权对下级法院进行监督, 以此类推, 同样有权对仲裁庭进行监督, 进而认为其有权发布禁止仲裁令。尼日利亚法院的这一观点实属对法案进行扩张解释, 仲裁庭是依当事人合意组成的, 是和法院相互独立的机构。而法院是依国内法律设立, 上下级法院同属一国司法系统, 上级法院可对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指导和监督, 对于下级法院的判决, 可依当事人的上诉申请进行审查。因此,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权并不能直接类推出法院拥有对仲裁庭的监督权。且《尼日利亚仲裁与调解法 (2004)》第 34 条规定, 法院不可对仲裁活动进行干涉。^④ 可知, 除非法律明确规定或授权, 否则法院并没有权力干涉仲裁活动。根据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 (Competence-Competence), 应由仲裁庭决定对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以及是否

① SIAC Case No. ARB300/16/JCL, 参见 Zenith Global Merchant Limited v. Zhongfu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NIG) FZE, Ogun State Government and Attorney-General of Ogun State, High Court Ogun Division, Nigeria, 3PLR/2017/348 (HC)。

② 黄旭:《国际商事争议解决中的禁止仲裁令制度研究》,《北京仲裁》2020 年第 2 期, 第 95 页。

③ Article 13 of Nigerian Federal High Court Act (2004): “(1) The Court may grant an injunction or appoint a receiver by an interlocutory order in all cases in which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o be just or convenient so to do. (2) Any such order may be made either unconditionally or on such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the Court thinks just.”

④ Article 34 of Niger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2004): “A court shall not intervene in any matter governed by this Act except where so provided in this Act.”

继续进行仲裁。这一原则也已被《尼日利亚仲裁与调解法（2004）》所采用。《尼日利亚仲裁与调解法（2004）》还进一步规定，即使当事人已在法院提起诉讼，只要在第一次实体陈述前要求仲裁，当事人仍可发起或继续仲裁，并获得仲裁裁决。^①可见尼日利亚法律并没有禁止平行程序，也没有规定法院可对仲裁进行限制。

此外，仲裁协议中约定在新加坡仲裁，尼日利亚法院认为仲裁协议约定仲裁开庭地（venue）为新加坡，而非仲裁地（seat），并进一步指出尼日利亚与案件联系最密切，且已采纳联合国国际贸法会仲裁规则，当事人选择将联合国国际贸法会仲裁规则作为仲裁程序法（lex arbitri），可视为选择了尼日利亚法律为仲裁程序法，因此尼日利亚为仲裁地，尼日利亚法院拥有司法监督权。尼日利亚法院的这一解释属对当事人本意的背离，扩大了尼日利亚法院对仲裁的干预权。仲裁协议约定在第三国新加坡仲裁，既是基于对新加坡在国际仲裁上享有良好声誉的考量，以保证仲裁的公正性；也是基于对尼日利亚法律程序公正性的担忧，希望避免或减少尼日利亚司法对仲裁的干预。仲裁地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仲裁庭管辖权、仲裁协议有效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涉及哪一个具体法院有权对仲裁协议及仲裁裁决实施监督。仲裁地通常由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若未在仲裁协议中予以约定，则由仲裁庭确定或依据适用的仲裁规则确定。^②在本案中，仲裁协议既已约定在新加坡仲裁，新加坡应为仲裁地。即使存在协议约定不明之处，根据所适用的联合国国际贸法会仲裁规则，^③也应由仲裁庭确定，而非法院。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国际仲裁的基石，是仲裁庭管辖权的基础，法院禁止仲裁令的发布将会对国际仲裁制度造成严重的冲击和破坏，从而使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被架空。然而这并非尼日利亚法院首次持该观点发布禁止仲

① Article 4 of Nigerian Arbitration and Conciliation Act (2004): “(1) A court before which an action which is the subject of an arbitration agreement is brought shall, if any party so request not later than when submitting his first statement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pute, order or stay of proceedings and refer the parties to arbitration. (2) Where an action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 of this section has been brought before a court, arbitral proceedings may nevertheless be commenced or continued, and an award may be made by the arbitral tribunal while the matter is pending before the court.”

② 赵秀文：《论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地点及其确定》，《时代法学》2005年第1期，第15页。

③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2013）第18条：“（1）各方当事人未事先约定仲裁地的，仲裁庭应根据案情确定仲裁地。裁决应视为在仲裁地作出。”

裁令, 尼日利亚法院在 *Shell v. Crestar* 案^①中也以同样的理由签发禁止仲裁令, 禁止 Crestar 继续在伦敦进行仲裁。此外, 尼日利亚法院在国内仲裁案件中也签发过禁止仲裁令, 以阻断仲裁程序进行。^②

尼日利亚现有法律并没有对法院签发禁止仲裁令进行明确规定, 但尼日利亚仲裁法要求法院不得对仲裁进行干预或限制, 也没有禁止平行程序。尼日利亚法院频频签发禁止仲裁令, 扩张了法院的权限。尼日利亚法院的行为虽然属自由裁量权范围内, 但却是对仲裁制度的限制和侵蚀, 这与尼日利亚仲裁法支持仲裁的立法本意, 以及各国支持仲裁的趋势相背离, 也会引发对尼日利亚司法公正性的进一步担忧, 给在尼日利亚的中国投资者寻求仲裁救济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 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突破路径

虽然目前中国在尼日利亚的投资争议案件较少, 但随着中尼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入会逐渐增多。^③ 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虽是首例中企在尼投资仲裁案, 却反映了在现有投资协定框架下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困境。在寻求投资争端机制的突破途径时, 需考虑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 在合理利用现有机制的基础上, 在中尼合作持续深入的框架下, 依托母国的力量, 从合作机制和投资协定上实现进一步突破。

(一) 在当前 BIT 框架下审慎选择争端解决方式

《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规定了投资者可通过磋商、诉讼和仲裁解决投资纠纷, 其中磋商程序为前置程序, 即投资者进入下一程序前必须

① *Shell Petroleum Development Co. of Nigeria Ltd. v. Crestar Integrated Natural Resources Ltd.*, (2015) LPELR - 40034, the Court of Appeal Sitting at the Lagos Division, Nigeria.

② Babatunde J. Fagbohunlu,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Court Intervention Survives in Nigeria...But How Far will the Courts Go?" *Kluwer Arbitration Blog*, 2 August 2013,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13/08/02/the-principle-of-limited-court-intervention-survives-in-nigeria-but-how-far-will-the-courts-go/>. Accessed 2022 - 09 - 30.

③ 朱伟东:《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分析——基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相关案例的考察》,《西亚非洲》2016 年第 3 期, 第 156 ~ 157 页。

先采用磋商方式解决争端。顾及与东道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磋商方式不仅能友好地化解争端，还能促进中国投资者继续和东道国开展合作，其应作为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首要程序。

《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并未要求投资者必须用尽东道国救济，而是允许在诉讼和仲裁中选择其一，即岔路口条款。但对于中国投资者而言，应尽量避免选择在尼日利亚法院诉讼，主要原因有：（1）尼日利亚法院为三审终审制，即州/联邦高等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且对于审理期限没有具体的时间限制，致使法院效率低下、拖延现象严重，如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法院受理案件近2年后还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2）尼日利亚法院可能存在本地保护等现象，这不利于维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同样是在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中，中富公司提起的诉讼程序近2年还未进行实体审理，而赞尼特公司提起的禁止仲裁令申请才几个月便获得了批准；（3）若在尼日利亚法院提起诉讼，可被东道国视作阻断仲裁的理由，BIT中规定的岔路口条款要求投资者只能就诉讼和仲裁二者选一，一旦选择了在东道国诉讼，就意味着后续不能再依条约提起投资仲裁。虽然投资者可通过灵活的方式规避岔路口条款，但新近的仲裁案件表明，仲裁庭已开始采用宽松的方式适用岔路口条款，从而会给投资仲裁的适用带来不确定性。此外，尼日利亚法院还会在商事仲裁程序中以程序滥用为由签发禁止仲裁令，阻止投资者继续进行商事仲裁程序。

应优先考虑选择仲裁解决投资纠纷。在《中国—尼日利亚 BIT》、中非投资协定以及其他文件中均对仲裁持鼓励态度，鼓励企业利用各国和区域性仲裁机构解决争端，充分发挥仲裁在解决中非投资争端中的作用。^①截至2022年9月，已有包括中国和尼日利亚在内的157个国家批准加入《ICSID公约》，ICSID可受理缔约国国民和另一缔约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且缔约国必须承认和执行ICSID作出的裁决，这可使投资者实现权利救济。ICSID仲裁为一裁终局，且败诉方不能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只能向中心内部申请撤销，可避免法院对仲裁裁决的不当干预。ICSID仲裁庭在实践中更倾向于扩大其管辖权且易于支持投资者的主张。^②

① 朱伟东：《中国与非洲民商事法律纠纷及其解决》，《西亚非洲》2012年第3期，第85页。

② 徐树：《国际投资仲裁庭管辖权扩张的路径、成因及应对》，《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第186页。

因此,中国投资者可优先考虑在 ICSID 申请仲裁。此外,中国投资者还可以选择在其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临时仲裁,但尽量选择知名仲裁机构以及选择在《纽约公约》成员国内进行仲裁,以避免发生获得胜诉裁决却无法执行的情况。

(二) 更新《中国—尼日利亚 BIT》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尼日利亚 BIT》签署于 2001 年,至今已逾 20 年,属于中国对外签署的第三代 BIT 范本。^①在该 BIT 范本中,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已从仅征收补偿额可诉诸国际投资仲裁扩展到全面接受投资仲裁。该 BIT 规定的内容较为简单,且倾向于保护投资者。随着中国正在由资本输入国转向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并举,中国的投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从而需要对《中国—尼日利亚 BIT》重新审查更新。尼日利亚政府于 2016 年批准了新的 BIT 范本(《尼日利亚—摩洛哥 BIT》^②),并计划依据新的 BIT 范本对 1990 年至 2001 年签署的 BIT 进行审查和修订。^③因此,对《中国—尼日利亚 BIT》进行更新的前提条件已具备。

而在我国和非洲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中国—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④(简称《中毛 FTA》)中,其中的投资章节是我国与非洲国家间投资政策的最新体现。该投资章节全面详细地规定了投资及投资争端解决条款,引入了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新近成果,如对投资进行更详实准确的定义、允许东道国拥有税收规制权、放弃岔路口条款而引入弃权条款(No U-Turn)等。既可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投资保护,亦可平衡东道国利益。尼日利亚与毛里求斯同是非洲国家,且均已

① 韩秀丽、翟雨萌:《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外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国际法研究》2017 年第 5 期,第 31 页。

② 《尼日利亚—摩洛哥 BIT》由双方于 2016 年 12 月 3 日签署,但尚未生效。参见 <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treaties/tips/3711/morocco-nigeria-bit-2016>。Accessed 2022-09-30。

③ Bettina Muller and Cecilia Olivet, “ISDS in Nigeria: Investment Regime Reforms and the Threats of Joining the ECT”, Th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TNI) and Public Services International, 2021, p. 3.

④ 中国于 2019 年与毛里求斯签署了《中国—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该自由贸易协定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此前两国于 1996 年 5 月 4 日在路易港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毛里求斯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中毛 BIT》)正式失效,被《中毛 FTA》所取代。

加入了非洲自贸区,中国和尼日利亚可在后续以该 FTA 中的投资章节为参照范本,并结合两国国情,对 BIT 进行更新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新的 BIT 协议或 FTA 可考虑包括以下内容。(1) 扩大投资的范围,不仅包括直接投资还包括间接投资。投资范围可涵盖财产模式、企业模式和商业存在,亦可包括 EPC 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管理合同等。(2) 可对磋商制度进行详细规定,如应在提交仲裁前至少提前 180 日内发出磋商请求,请求内容应包括申请人名称和地址、投资者身份证明、诉请事项及理由依据、救济赔偿额等内容,使磋商制度更具操作性。(3) 可放弃岔路口条款,但允许继续向东道国法院申请投资救济,并将救济时间限制在投资争端事项发生后 24 个月内。(4) 可引入弃权条款,即投资者提交仲裁时,需提交书面弃权,放弃启动或继续行政救济、东道国诉讼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如商事仲裁)。该条款既赋予了投资者选择各种救济途径的权利,同时也避免了平行程序的发生以及岔路口条款的僵化适用。

(三) 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设立中非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对非合作“八大行动”在非洲做深做实,中国投资者可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寻求争议解决方法。中非合作论坛是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由中国及与中国建交的 53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共同设立的,旨在增进中非间的了解、扩大共识、促进合作。自 2000 年至今已召开八届部长级会议。伴随中非经贸纠纷的增多,中非双方于 2015 年 11 月在中非论坛机制下设立了中非联合仲裁中心(CAJAC),以解决中非企业之间的商业纠纷。相较于其他仲裁机构,中非联合仲裁中心是中非合作论坛的一部分,更熟悉和了解中非双方的社会现实、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能更有效地处理中非之间的经贸纠纷。但该仲裁中心目前主要受理中非商事争议,仲裁员名册中的外籍仲裁员也较少,无法有效解决中非投资争端。非洲国家正在对现有国际投资法和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革新,^①因而可考虑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设立中非投资争议解决中心以解决中非之间的投资争议,该投资争议解决中心可依托现有的中非联合仲裁中心设立,可分别设立调解中心和投资仲

^① 银红武、梁开银:《论非洲国际投资法规制的革新》,《时代法学》2021 年第 3 期,第 90~92 页。

裁中心。

调解中心可参考《ICSID 调解规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等制定专门的调解规则,并制定专门的调解员名册,调解员可由中非各国中精通本国法律与国际经贸法律和惯例的人员担任。同时原则上采用调解员与仲裁员相分离的模式,调解员不得在之后同一案件中担任仲裁员。为确保调解协议的执行效力,建议可在调解规则中明确规定,调解中心作出的调解协议在本国境内具有法律效力和可执行性,可像法院判决一样被强制执行。若调解不成功,允许当事人再选择在本仲裁中心或其他仲裁机构仲裁。

投资仲裁中心主要受理发生在中国和非洲各国境内的,中国/非洲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中国之间因投资而产生的争端。投资仲裁中心应制定本中心的投资仲裁规则,同时应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联合国国际贸法会仲裁规则。还应制定专门的仲裁员名册,仲裁员由来自中国和非洲国家的法律专家组成。此外,也允许双方当事人从仲裁员名册外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人员担任仲裁员,以确保投资争议得以有效解决。

结 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深入推进,中国逐渐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的双向大国,中国在非洲的投资额和投资纠纷也在逐年增多,中国投资者开始通过投资争端机制寻求救济,如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北京恒威交通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诉加纳政府案。作为中国投资者对非洲国家投资仲裁第一案,中山富诚诉尼日利亚案反映了中国投资者在尼日利亚运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困境,也反映出我国投资者在资本输出过程中对东道国法律和国际投资法律规则尚不熟悉。该案最终能获得全面胜诉,则是因为投资者在权益受损后并没有被动等待,而是主动适用国际投资法律规则,合理运用多种路径维护自身权益。同时依靠专业法律团队精准把控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条款,避免适用“岔路口条款”而丧失提起仲裁的权利。中国投资者在走出去过程中应主动了解东道国法律、熟悉国际投资法律规则以及注意了解中国和投资目的国之间是否存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投资权益因东道国的国家行为受到损害时,要主动利用现有国际投资法律和 BIT 寻求权利救济,适时设

计恰当的争议解决方案。尤其要注意“投资”定义、“岔路口条款”、用尽本地救济、禁止仲裁令等影响仲裁庭管辖权的重要条款或措施，避免贻误最佳的行权时机，错失正确的行权途径。

【责任编辑】李雪冬

The Historical Review and Thinking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Zhu Xu, Zhang Yue / 167

Abstract: The inter-part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African countri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plomatic work of the CPC an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hina's diplomatic layout. Due to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needs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have roughly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underpinning, enlivening, changing and flourishing. On the whole, inter-party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teractions, more frequent high-level interactions, richer content of interactions, and increasingly mature dialogue mechanisms. In the future, political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CPC and African political parties need to further consolidate their political foundation and strengthen interactions at the political level; expand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emphasize the role of democratic parties; build a cooperation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words: The CPC; Political Party Interactions; Political Party Diplomacy; Inter-party Relations;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Dilemma and Way-out of Chinese Investors Seeking the ISDS Mechanism in Nigeria

—An Overview of *Zhongshan Fucheng v. Nigeria*

Peng Xianqi / 184

Abstract: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 has gradually transitioned from a capital-importing to a capital-importing and capital-exporting country. China's investments in Africa have grown dramatically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vestor countries. The investment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have also increased. The first investment arbitration case brought by a

Chinese investor against an African country is *Zhongshan Fucheng v. Nigeria*. It reflects the quandary of Chinese investors who use ISDS mechanisms for resolving investment disputes in Nigeria. Denial of judiciary, issuance of an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prohibit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and challenge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jurisdiction by invoking the fork-in-the-road clause are all examples. It is due to the lack of knowledge with the ISDS mechanism and the local protection of the host country cour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Chinese investors should carefully select dispute resolution methods under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BIT. When it is appropriate, they can propos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China-Nigeria BIT need to be updated or that an FTA need to be signed. Finally, they can seek to establish a China-Africa Investment Dispute Resolution Center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Forum of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ettle China-Africa investment disputes amicably.

Keywords: *Zhongshan Fucheng v. Nigeria*; Fork-In-The-Road Clause; 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 China-Nigeria ISDS

An Analysis of Repor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Mainstream Media in West African Countries

Wang Heng, Zhu Weiming / 204

Abstract: China's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West African countries in recent years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local media for its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Through their repor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mainstream media in West Africa have demonstrated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Due to historical and current reasons, China's communication efforts in Africa continue to face challenges. This paper takes the reports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y mainstream media in West African countries from 2017 to 2021, as an example for case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related reports by mainstream media in West Africa,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national image communication in West Africa, and explores practical ways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national image in Africa through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